

论俄罗斯激进经济改革的特点与后果

李默海

[摘要] 20 世纪最后十年间发生在俄罗斯的激进式经济改革, 从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说可谓是一场大革命, 对俄罗斯社会经济的破坏程度之深是史无前例的。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很多。完全照搬拉美国家模式, 完全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 无疑使改革在一开始便走上了歧途; 脱离本国国情实施私有化加速战略为极少数人和集团瓜分国有资产提供了绝佳的契机。私有化改革的策略与方法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如税制不合理, 并由此滋生出了大量社会恶果。这一切都决定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建设之路还会很长很远。

[关键词] 俄罗斯; 激进经济改革; 私有化; 自由化

[中图分类号] F1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 (2008) 01-067-04

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 20 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改革, 更是吸引着全世界众多学者和人们的关注。20 世纪最后十年发生在俄罗斯的这场激进式经济改革在国家的内政、外交、经济及社会领域产生的影响之大, 涉及范围之广, 可谓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以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主要内容, 并且引发了现行所有制的转型。尽管时间已过去 10 多年了, 但俄罗斯的激进经济改革至今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总结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对于中国的改革也是不无裨益的, 毕竟我们的改革不仅需要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经验, 也要从别人的实践中获取经验。

一、俄罗斯对自由化模式的选择

从一个完全的行政性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化绝非易事, 失误在所难免, 但我们认为, 俄罗斯那场激进式改革引起巨大社会动荡的关键问题在于, 俄罗斯的改革家们并没有意识到主观上的问题, 反而把改革期间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模式。事实上, 各届联邦政府也一直坚信这样一个信条: “只要砸烂集权专制的经济模式, 市场经济模式会自动建立起来”。^[1]

俄罗斯的改革与拉美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改革颇有相似之处。

1982—1983 年的危机促使拉美各国向新自由放任主义

改革进行过渡。拉美各国的危机局势要求必须对现有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大修改, 并制定相应必要的措施以保证这一过程能够正常进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出一整套稳定经济的纲领。然而, 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套稳定性经济纲领, 不仅没有给拉美各国带来所期望的预期效果, 各国外债反而急剧增长: 1975 年各国外债总额为 450 亿美元, 1980 年已达到 1280 亿美元, 这个数字正是一个国家经济安全是否衰退的最重要的指数之一。再加上无法按时偿付和延期偿付的利息, 各国的债务负担不断加重。1985 年, 拉美各国债务是 3130 亿美元, 1990 年为 4400 亿美元, 1995 年为 5730 亿美元, 1996 年则到了 6100 亿美元! 拉美诸国从此便被列入世界最大债务国行列。^[2]基于这种情况, 从 1985 年中期开始, 秘鲁政府宣布不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本国对外债务关系中的中介行为。随后不久, 巴西总统萨尔奈也中断了与基金组织的合作, 不再与其共同制定本国的经济发展规划。这对债权国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因为它随时可能引起其它债务国要求延期偿还债务或者做出单边决定。在此情况之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向各债务国实施更加严厉的金融政策, 决不允许任何拖欠行为。在国际基金组织随后推出的新建议当中, 甚至包括了将债务纳入实行私有化的机制中去的要求。

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对拉丁美洲来说, 不仅在经济发展意义上是“失去的十年”, 而且在民主化建设、政治制度改

* [收稿日期] 2007—10—19

[作者简介] 李默海, 法学博士, 山东工商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主要研究政治学原理与中国政治发展。 山东烟台 264005

革方面也落后了许多。因此,在许多拉美国家中,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统治阶层,都对本国的经济改革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进行合作产生了极大不满。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和秘鲁等国政府因为担心自己会陷入被国际金融组织所隔离的境地,所以,经常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直接执行者——拉美各国的经济与财政部长们——于是便常常把债务负担转移到政治和法律地位最低的阶层身上,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民众暴动,如委内瑞拉 1989 年人民暴动便是很好的例证。

在俄罗斯改革之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内容几乎一模一样的纲领与该附加条件同样也“推荐”给了俄罗斯的改革家们。值得指出的是,在力图将自己的“经验”应用到发展俄罗斯经济方面的同时,国际金融组织的许多专家都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俄罗斯不属于“第三世界”,它从来没有属于过“发展中国家”行列。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是属于第二世界的国家,工业力量高度发达,人力资源也非常雄厚。因此,那种认为俄罗斯也可以借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的经验的观点,即使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影响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所依赖的激进自由化模式被俄罗斯政府当成了自身的发展准则。实际上,俄罗斯政府所引进的仅仅是 19 世纪传统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个人主义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如何,现代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主要是,国家既是自由竞争条件的创造者,又是社会稳定的保障者,为了保证社会公正,国家可以为确保低收入者的利益而对国民收入进行重新分配,制定各种社会纲领。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东西在俄罗斯被忽略了,因此,俄罗斯大多数人的利益被少数人侵吞掉了。^[3]

在俄罗斯激进改革家们所倡导的经济改革中,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便是要把国家从经济领域中“排挤”出去。削弱国家的作用正好符合了激进派改革家们的意愿,即他们倡导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某些集团、家族以及个人私利。按照俄罗斯改革家们的说法,向“市场经济”转轨就需要改变所有制形式,也就是说,把全部国有资产转交给个人。所以,他们搞起了轰轰烈烈的私有化(或者叫非国有化)运动,把各类工厂、企业及其配套设施转交给私人以提高其效率。而且他们还宣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私有化。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教授曾经对如何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私有化战略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为此,他提出了两个战略——自然发展战略(战略 A)和加速私有化战略(战略 B)。^[4]按照科尔奈教授的看法,战略 A 的最重要任务是为“自下而上”发展私有经济创造有利条件,其主要刺激因素就是社会上会涌现出大批私人企业家。为达到这一

目的,就必须铲除阻碍自由进入市场的障碍,保障私有财产的权利,为此需要制定专门制度以保证大家遵守合同的责任与义务,采取相应的社会措施以促进私有经济发展,如在税收和信贷政策方面。

为实现这一战略,大部分国有公司、企业都应该以出售的方式进行私有化。国有资产应当主要出售给“局外人”,优先卖给那些不仅能够以公平合理的价格进行收购,而且还能对企业进行投资和有效管理的人。如果购买者是“局内人”的话,出售价格仍然要保证公正合理,但一定要避免以任何赠送的方式出让国有资产。实施该战略时,必须对企业的财政预算给予更加严格的限制,需要制定严格的金融制度,如果不遵守它,市场经济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除此之外,还必须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包括破产法、会计核算法和银行法等,并确保其得到实施。为了确保能够顺利渡过转型期,仅仅依靠“三架马车”——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是不够的。对于一些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既不能随意将其进行私有化,也不必长期人为地使其“苟延残喘”。随着各种财政预算限制的加强,它们也会发生自然淘汰。至于那些由于其市场估价几乎近于零或者是负数而不能出售的企业,则应当经过破产程序使其破产,而不是随便赠送给某人。

加速私有化战略(战略 B)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尽快消灭公有制,将国有资产变为私有。该战略指导下的私有化方式是通过如私有化有价证券等形式对国有资产进行分配,把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在同等条件下免费分配给全体公民。同时,为了刺激企业发展,在适当条件下也可以将部分企业出售给商人。但在很多情况下,商人收购企业都成了“假购买”,因为他们为所购财产支付的费用很少,有时甚至一分钱也不付。

比较这两种战略,二者最大的区别是:战略 A 强调要健康发展私有经济成分,而战略 B 则强调要优先尽快消灭国有经济成分。在《通往自由化经济之路》一文及其它相关文章当中,科尔奈都建议选择战略 A。

从俄罗斯的现实国情来看,用刺激私有经济成份自然健康发展为宗旨的战略 A 是可靠的,也是切实可行的。选择战略 B,其结局只能是效率低下,甚至是损失惨重。科尔奈在文章的最后专门指出,俄罗斯实施战略 B 是最不成功的一个例子。^[5]

二、俄罗斯自由化改革的主要特点

俄罗斯选择的所谓债券私有化模式方案实际上非常简单:全部国有资产被估价为 15000 亿卢布,以有价债券的形式平均分给 1.5 亿个居民。这样一来,每位俄罗斯居民获得了价值 10000 卢布的国有资产。

占有全部工业生产能力的 75—76% 的重工业企业,保证居民日用消费品需求的轻工业生产企业,效益良好的国营

农场和集体农庄, 国民普及与高等教育, 基础科学和卫生保健系统,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改革, 但不是毁灭。私有化的任务不应该是破坏国有资产和砸烂国家所有制, 而是应该将其充分利用, 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效发展。但在经过了如此“闪电”般的私有化之后, 国家以极低的价格把巨额财富“卖给”了为数不多的集团与个人。国家一下子就变成了穷光蛋, 社会公共事业更是一落千丈。在国家大举进行各种私有化改革措施的同时, 没有像过去一样对社会公共事业(如教育、医疗保健和儿童教育设施等)进行财政拨款。

波列万诺夫所著的《大骗局的艺术》一书可以说是对私有化结局最深刻的思考, 在该书中作者引举了大量的事实与论据, 对国家私有化进程与结局做了深刻的分析与思考。按照波列万诺夫的看法, 私有化的结果极大破坏了俄罗斯国民经济。俄罗斯的这场私有化改革无论在战略上, 还是在战术上, 都出现了巨大失误, 国家根本就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通过收购和转售大批有价证券, 大量国有资产实际上以极低的价格慢慢转移到了少数私人或集团手中。两年中, 各级财政收入仅为 10000 亿卢布。俄罗斯最大的企业之一莫斯科利哈乔夫工厂, 实际价值至少为 10 亿美元, 但仅以 400 万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莫斯科化工干部培训学院的所有办公大楼及相关设施实际价值至少为 1 亿美元, 但实际上只卖了 800 万。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是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有资产“大挥霍”, 这次“大挥霍”也成为日后各类冲突和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6]

这场私有化闹剧之所以产生如此恶劣后果的客观原因是: 国家长期垄断经营和军工企业过度发展所造成的畸形经济结构; 由于苏联的解体, 原来的各种经济联系遭到破坏; 权力部门之间争权夺利; 老百姓没有做好应对改革的准备, 对改革知之甚少, 等等。主观因素是: 私有化进程速度过快, “政治化色彩”过浓(改革中, 政治目的占了主导地位, 改革家们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制造一个广泛的私有者阶层, 其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改革不可逆转)、缺乏计划性。

自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企业税收问题。按照原来的计划, 私有化企业经过高效经济运转之后, 将很快摆脱亏损状况, 成为盈利企业, 其税收状况也相应有所好转, 纳税额自然随之提高。然而, 现实情况却是, 俄罗斯的税收立法成了企业发展、吸引国内外投资的主要障碍。德国经济联合会税务委员会在俄罗斯所作的调查资料显示, 企业实际所缴纳的税收额如果按照国际通用惯例计算的话, 占了利润的 51—100% (这里考虑到了最多税收种类)。虽然不同行业(生产、商业和服务)税收存在着一定区别, 但相对于营业额来说, 该数字还是相对固定的, 即 9—13%。这就是说, 不管自身财政状况如何, 企业所获得的每 10 个卢布当中的 1 个卢布都得上缴国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税收制度的不合理对生产企业产生的负面影响要更大一些, 因为生产企业承受的税收负担原本就比贸易企业承受的税收负担要重得多。实际上, “新”税收制度的主要问题就是当中隐藏着对诸多工业部门尤其是生产性企业的歧视性税收政策。俄罗斯生产企业的状况一直萎靡不振, 歧视性税收政策是责无旁贷的。

毫无疑问, 建立可靠的法律保障, 确定合理的制裁范围, 对发展企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奇怪的是, 新“税法”总是在其实施细则出台之前就已生效, 这一点妨碍了纳税人正确履行自己的纳税义务。更有甚者, 税务机关经常执行的往往是与法律本身相违背的特别的实施细则。俄罗斯各种税收标准大都模糊不清, 有些甚至自相矛盾。许多地方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根本就不具备足够的税法知识和财会统计规则, 但在实施惩罚性措施的时候, 他们却从不会怠慢。用俄罗斯商人的一句话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心黑手辣”。税务机关可以随意确定纳税额度, 肆意采取财政制裁措施, 可以肆无忌惮地从企业账户上划走任意数目的资金, 而从不考虑到是否应该给企业留下其发展所要求最低数额的资金。

三、俄罗斯私有化的计划与结果对照

在国营和市政企业的私有化国家纲领中, 俄罗斯联邦政府曾经计划要解决 7 个主要问题, 在经历了狂风骤雨般的激进改革之后, 实际结果如何呢? 下面就让我们把俄罗斯改革家们最初宣称要完成的任务和私有化之后的主要结果做一下比较:

第一, 建立广泛的私有者阶层, 以保证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表面上看, 似乎广泛的私有者阶层已经建立起来, 但事实上却是少数人攫取了大量的国有资产, 出现了仅占俄罗斯居民极少数的“俄罗斯新贵”, 大批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一夜之间跌落到贫困线之下。

第二, 通过私有化提高企业生产效益。实际情况是, 无论是被私有化了的企业, 还是现存的国营企业, 生产效率都很低下。

第三, 利用私有化所带来的收入, 确保居民社会福利有所保障, 发展社会基础建设项目。现实情况是, 私有化改革在两年的时间里仅仅给俄罗斯各级财政带来了 10000 亿卢布的收入, 还不到匈牙利私有化收入的二分之一。

第四, 促进俄罗斯联邦金融状况的稳定。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 俄罗斯的财政金融状况根本没有稳定下来。1994 年的 10 个月内, 俄联邦统一预算完成的情况是: 收入 1247 亿卢布, 支出 1678 亿卢布。统一预算赤字为 477 亿卢布,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0%。而 1993 年同时期预算赤字占国民总收入的 9.8%。1994 年联邦预算结构比统一预算的情况还要糟糕。1994 年的 10 个月内, 联邦预算赤字为 498 亿卢布, 占国民收入总值的 10.7%, 1993 年同期仅为 6.4%。

第五,建立自由竞争环境,促进消除国民经济垄断壁垒。这一任务同样也没得到解决,因为哪怕仅从技术角度来讲,俄罗斯大部分企业的落后生产状况无法跟西方相竞争。1994 年俄罗斯机械制造业缩减了 45%,日用品市场缩减了整整一半。不惜一切代价来消除垄断壁垒,却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本国的工农业生产综合体,中断了各种技术和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

第六,吸引外资。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委员会的资料显示,外资规模急剧减少,1993 年外商投资总额为 29.21 亿美元,1994 年前 9 个月仅为 7.68 亿美元。

第七,为进一步扩大私有化规模创建有利条件和组织机构。尽管国有财产国家管理委员会、联邦财产俄罗斯基金会、企业破产联邦办事处以及各类债券投资基金会等一系列机构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建立起来,但私有化进程的“官僚化”根基也牢牢树立了起来。

上述七项私有化任务之中只有第七项得以完全实现,第一项部分得到实现,其余五项全都“破了产”。

总之,俄罗斯改革家们所期望的私有化改革并没有起到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指导私有化改革的方针、基本原则和实际操作方法都出现了问题,私有化纲领本身也缺乏明确的目标定位。无论是债券私有化,还是货币私有化,基本上都成了只为极少一部分小团体利益服务的财产分配方式。因此,整个私有化进程几乎没有带来任何投资和经济增长,生产者本人依然没有成为财产的主人,和过去一样,与己无关的财产依然还是徇私舞弊和投机倒把的目标。

结 论

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家们在铲除国家行政命令管理体制的同时,连国家组织也一同拆毁了,其结果是造成国内史无前例的经济大混乱和政府的软弱无力。

如上所述,自由主义改革中所存在的政治性缺陷,尤其是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弊端和不合理甚至是荒谬的税收制度,构成了俄罗斯经济活动“影子化”的直接原因。^[7]

改革所造成的国家政治混乱、经济上管理不善及社会动荡不安等恶劣后果,为各种犯罪组织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形形色色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已经成了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块恶性肿瘤。除此之外,俄罗斯的“影子经济”也在快速增长,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对本来就不景气的俄罗斯国家财政无异于雪上加霜。

所谓的对外贸易自由化,在俄罗斯变成了全面向国外输出原材料、战略物资、各类武器,倒卖一切财产,甚至包括拆下来的铁轨、城市输电和通讯电缆。

俄罗斯资本家最终得到了他们所希望的“自由”,“但这绝不是合法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是缺乏平等竞争的自由,是原来官僚行政垄断组织摆脱了必须为国家负责的自由”。^[8]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俄罗斯联邦政府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员连同加拿大西奥塔利奥大学的专家们首次对俄罗斯 20 世纪 90 年代“资本外流”现象进行了综合性国际研究。根据专家们的鉴定,“连同改革最初两年沉积下来的资产一起,从俄罗斯‘流失’的资产总额,截止到 1997 年年底,达到了 1250—1400 亿美元。”^[9]

总的来看,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形成的经济体制模式与其它国家的典型模式是不一样的。国外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在经济基础当中拥有独立于国家的经济实体。而俄罗斯则不同,原来的国家政治权力机构通过改头换面依然渗透到经济基础中来,成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取代了实际经济主体应有的职能,经济实体根本无法正常发挥其功能。现实告诉我们,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建设之路还很长很远。

【参考文献】

- [1] [俄] 波捷明 . . . 虚拟经济和超现实主义: 面向 21 世纪的俄罗斯经济 [M]. 莫斯科: 2000. 35.
- [2]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Latin America . Los Angeles, 1992. Vol. 29, prt. 2 . 1287- 1290.
- [3] [俄] 西特诺娃 . . . 从多范式观点看俄罗斯社会经济改革 [J]. 莫斯科: 社会学研究, 2000, (2).
- [4] [5] [匈] 科尔奈. 通往自由经济之路: 十年之后 [J]. 莫斯科: 经济问题, 2000, (12).
- [6] [俄] . . . 波列万诺夫. 大骗局的艺术 [M]. 莫斯科: 1995. 15- 31.
- [7] [俄] . . . 雷芙金娜. 俄罗斯“影子经济”的原因与后果 [J]. 莫斯科: 社会学研究, 2000, (2).
- [8] [俄] . . . 普努林. 历史的报复: 俄罗斯二十一世纪战略主动权 [M]. 莫斯科: 1998. 64.
- [9] [俄] . . . 阿巴尔金. 金融市场结构的质变和俄罗斯资金外流现象 [J]. 莫斯科: 经济问题研究, 2000, (2).

(本文责任编辑 王云川)